

# 量化与比较： 量化比较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

李伯重<sup>①</sup>

**摘要：**在历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是重要的方法。如何将这两种方法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这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经济史与比较史学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往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比较与量化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量化方法如何在比较研究中的实际运用等4个方面。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用这两种方法对中国经济史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量化；比较；江南；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 (2018) 01-0053-12

## 一、中国经济史与比较史学

中国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先生说过：“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的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等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sup>①</sup>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时期的经济，和别的国家（或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东西，才有共同规律。当然，既然是不同的对象，彼此也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比较史学就是通过对不同对象的比较来发现共同规律和不同之处的。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比较史学就是通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对历史认识的方法。

比较史学兴起于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比较史学不是在中国兴起而是在西方或者说欧洲兴起？原因很简单，欧洲自古就是分裂的。在历史上，欧洲通常存在诸多大小不等、种类有异的政治实体。即使是罗马帝国，也只是把欧洲部分地区统一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基本上也是分裂的。如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就有几百个小邦，每个小邦都有自己的君主、政府、军队、法律和货币。所以，欧洲是一个分裂的大陆，而且欧洲置身于北非、中东和西亚等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包围之中。因此，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遇到和自己不同的人，彼此有很多接触，也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他们会注意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如古希腊人就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民族，把周边的民族都称为“蛮族”。他们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蛮族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比他们优越在哪里？为什么？等等。罗马人也如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比较。所以欧洲很早就出现了比较研究。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基督教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欧洲人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伊斯兰文明。当“蒙古旋风”席卷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又想知道蒙古人为什么会这样强大？他们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和自己有这么大的不同？等等。因此，比较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到了近代，比较研究才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时出现了很多民族国家。典型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者以一个民族为主，由一个政府治理，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欧

<sup>①</sup>作者简介：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100084）。

<sup>②</sup>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洲,民族国家大概16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冲突也更多了,于是就更要多认识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且进行比较。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因此,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比较史学也随之兴起。可以说,比较史学在欧洲源远流长,近代则日益成熟。

实际上,作为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历史比较研究在西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到了近代早期,历史学家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3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史学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到了20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斯宾格勒、汤因比这些大家。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这些词语,就是汤因比发明的。欧洲有这样长远的传统,而中国没有,原因是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虽然周边有很多邻邦,但是在强势的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历史上看不起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旁边都是“蛮夷小邦”。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口气非常傲慢,根本不把“蛮夷”看在眼里。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发现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也不是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世界唯一的伟大文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明,甚至有些比我们更强势。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感到应该多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通过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才能够认识中国自身的历史。这样,他们就将西方的比较史学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目前,比较史观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魏晋隋唐史大家王仲荦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文中写道“不同国家的封建社会,有它们的共同点,也有它们不同的特征。譬如在欧洲,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东方的印度,村社残余特别严重,土地是村社所有,买卖也受到限制。而在中国却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较早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井田制、书社制的崩溃,土地开始可以自由买卖。即使在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辽金的村社组织,土地买卖受到一定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占主导地位。”<sup>①</sup>王仲荦先生研究魏晋隋唐史,而在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与欧洲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似乎谈不上中西比较研究。但王仲荦先生在文章中用的“封建社会”“领主制”等概念,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使用这些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有一个隐含的比較的意味,即在用西方的历史来和我们的历史进行比较。因此,哪怕只做中国研究,但实际上已经受到比较史观的影响了。如果是乾嘉学者,绝不会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因为他们从未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进行比较。

“封建社会”这个词,并不是中国原有的。中国古代文献里的“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而我们现在说的“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学者从欧洲引进feudal这个词,用了汉字“封建”。确实,这个翻译比较符合日本的历史实际,但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呢?中国学者在从日本引进“封建”这个词时,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更没有考虑“封建制度”在欧洲是否是一种普遍制度的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欧洲,封建制度也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欧洲史专家马克垚先生指出“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话。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无论是把封建主义当作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都会遇上它能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即“封建”有无普遍性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很早就开始了。马先生指出“西方学者把

<sup>①</sup>王仲荦《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的9到13世纪的材料,是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作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sup>①</sup> 因为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依靠的是欧洲某些部分发现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所以把封建社会当作西欧的普遍的政治经济形态也是有问题的。至于这个结论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更需要进行检验了。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就拿它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有问题的概念作为比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历史,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在1929年出现了一个“社会史大论战”,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封建社会。到了1950年以后,史学界接受了中国确实有封建社会的观点。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争议: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是一样的吗?我的老师傅衣凌先生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因此他把中国的封建社会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的封建社会。<sup>②</sup> 我当时在跟傅先生读书,问他“‘早熟而又不成熟’,到底应当怎么理解?”傅先生对此也感到困惑,因为这还是拿欧洲的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看中国历史,而这种模式又是从欧洲一个很小的地域发现的材料得出的。到了现在,欧洲的材料发现了很多,学者们认为欧洲即使有过封建社会,也是各不一样的。因此,傅先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郑重声明不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名词,而改用“传统社会”。因此,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比较的标准改变了,比较史观也要随之不断修正。

## 二、以往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往的比较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简单化的比较。通常只要找出两种事物的一些共性与个性,就得出结论。所以从前读的一些书中,常常说中国怎么样,西方怎么样,然后就得出大结论,说中国优于西方或者不如西方,论证非常简单,没有提供充分证据。

其二,比较多描述性,主要是表象的比较。如20世纪80年代有一本《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对“东方”和“西方”3000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当时大家要解放思想,因此这个比较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问题当然就大了。比如“东方”指哪些地区?在中国之外,印度、日本、东南亚、蒙古是不是东方?同样的,“西方”,今天大多指基督教世界,而基督教内部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基督教世界有众多国家,从欧洲延伸至俄罗斯、南北美洲、大洋洲。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还有希腊罗马等非基督教文明。这样大的地域范围和这样长的时间范围怎么去比较?所以这样的比较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比较。

我认为,正确的比较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比较的事物必须有可比性;第二,比较的对象应该有确定的时空范围;第三,比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第四,比较应该分为不同的层级,该进行哪一级的比较,就进行哪一级的比较。有了以上这些,才能进行正确的比较,而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煮成一锅粥,胡乱炖出结论来。

首先,可比性。不同的对象之间是不是有可比性,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先秦时墨子就说过“异类不比。”(《墨子·经说下》)意思是不同性质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这一点,这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糜与霍孰燿?蚘与瑟孰瑟”(《墨子·经说下》)过去很多比较实际上

<sup>①</sup> 马克森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9页。

<sup>②</sup> 傅衣凌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就是进行不同性质事物的比较。比方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今天为止还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深层的支柱之一。在这本书里，韦伯对世界上的各种文明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在各种文明中，只有新教文明可以引起社会经济的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特别批评中国的儒家文明，说这是一个保守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妨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这个观点有深远的影响。韦伯比较的是文化，但是文化是不是一种同质的东西？可不可以进行比较及怎样进行比较？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的争论一直都很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明确批驳韦伯的理论。余先生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家精神并没有阻拦现代化的进程，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比基督教精神更大的成就，比方说日本和“四小龙”的兴起。余先生认为，韦伯的错误在于，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并不很了解其他的文明。其次，韦伯进行文化的比较，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比的。所以，即使像韦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进行的是不同性质对象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很可能有问题。

其次，比较还必须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刚才说的“东西方”比较，“东方”“西方”到底指的是什么？按一般人的理解，“东方”就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亚洲。那么，亚洲包括多少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呢？至少包括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等大文明，而每种大文明中又包括了许多次文明。有非常多不同东西包括在内，怎么能说它是一个同质的“东方”呢？“西方”也是一样，通常指的是欧洲及其衍生物——大航海时代以来的美洲和澳洲。在“西方”内部，也包括了天主教文明、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等文明。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空间范围，就无法进行真正的、正确的比较。以往人们常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有什么异同，但是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时段，也并不明确。一些学者往往把欧洲一些地区在中世纪全盛时期（中世纪中期）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判断中国明清时期的情况。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过去许多学者常常拿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以了解中国为何不能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和经济近代化。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土和人口方面有巨大的差异：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领土比现在要大出三分之一；人口也众多，1750年，中国人口达到2.7亿，按照李中清和王丰教授的估计，约占全世界人口的40%。<sup>①</sup>但英国今天的面积才27万平方千米，1750年人口只有大约570万。中英之间存在那么巨大的差别，怎么进行比较呢？

因为中国太大，国内各地的差别又非常大，因此在和英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做法：选几个地方作为代表来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在经济史方面，第一个被选的地方就是江南，即长江三角洲。江南至少从唐后期以来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找一个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个做法当然是不对的。江南的人均GDP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已达到21190美元，等于同年英国人均GDP的60%，法国的65%，大大高于前苏联集团国家。而中国的西藏、甘肃、贵州等地，与江南的差别非常大。如果江南可以代表中国，那为什么西藏、甘肃、贵州不可以代表呢？因此，只有把中国的各个地区研究好，找到共性，才能说这是中国，然后和他国进行比较。我们的经济史学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套用西欧经济发展的模式。比如封建社会瓦解，接着工业革命发生，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社会，这本来是从英国经济发展历史中得到的，但这个规律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这却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还是少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走到这一步。

再次，比较的标准。比较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有统一的标准。在比较的时候要注意比较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过去我们在用欧洲模式观察和判断中国历史的时候，会

<sup>①</sup>参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遇到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方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 中国史学界展开了全盘学苏联的运动, 把中国传统社会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没落的、衰败的社会, 没有内在的活力, 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唯一的出路是革命, 而革命又是在外部影响下出现的。也就是说, 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抗, 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这实际上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的变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但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归结为外界影响,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主要的。如菲律宾前后受到西班牙、美国统治了好几个世纪, 但今天依然是东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相反, 没有受西方统治的日本, 却成为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所以, 把外力的影响放在第一位是不对的。但如果中国的传统社会真是一个停滞的社会的话, 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只能来自外部, 对此中国学者很困惑, 于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进行质疑,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依照这个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也有发展动力, 这种动力和西方近代早期社会发展的动力相似, 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只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没有, 是中国经济史学家的发明, 吴承明先生是这个理论的集大成者。根据这个理论, 从明朝后期开始, “资本主义萌芽”就已出现,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但由于各种原因, 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 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中断了。这个理论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大创新, 值得高度评价。但它还是用西欧(主要是英国)的发展模式为标准进行比较, 希望用这种“共同规律”来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因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个理论。吴承明先生到了晚年, 也不再提“资本主义萌芽”, 而改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同样的, 傅衣凌先生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大创新。根据这个理论, 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和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同, 是“早熟又不成熟”。但“早熟”和“成熟”都是以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为标准, 而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距如此之大, 很难用西方的“共性”来套中国的“个性”。因此后来傅先生临终前在病榻上说, 中国没有封建社会。

最后, 比较的层级。根据不同的需要, 有些比较是浅层级的, 有些是深层级的。比方说进行社会性质的比较, 就是非常高层级的比较, 做起来很不容易。浅层级的比较做起来容易一些。如在经济史研究中, 选取 16 世纪江南的某一个地方(例如一个村子)的农民的生产能力和同一时期的英国、日本或者印度的某一个地方农民的生产能力进行比较, 这属于浅层级的比较。如果材料充分, 这个比较研究可以做得很好。每个学者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以及所关注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合适的比较。如果不顾一切就进入最高层级的比较, 最后说出来就是空话、大话、废话。彭慕兰在《大分流》这本书中, 特别强调进行合适的比较的问题。他说: “用英国与印度或中国来比较。但是印度和中国各自在面积、人口和内部多样性方面都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单个的欧洲国家更具可比性。”欧洲或者亚洲内的地区差别可能非常大, 比方说荷兰和乌克兰, 或者甘肃和长江三角洲。国家不是合适的比较单位。‘而在这两个次大陆内部, 一个自身与英国或尼德兰具备可比性的区域, 再加上亚洲那些与巴尔干、南意大利、波兰等地对等的区域进行平均后又失去了可比性。’<sup>①</sup> 因此, 只能选择那些具有较大可比性的地区进行比较。

彭慕兰说的道理对于研究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中国和印度都人口众多, 国内差异巨大。因此, 很难把这样的大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一个人口较少、内部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彭慕兰说: 欧洲、亚洲在经济上内部地区差异太大, 所以都不能将其视为均质体。他特别举例说, 在欧洲内部, 荷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sup>②</sup> 乌克兰是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之一, 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 号称“欧洲粮仓”。我读过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传记,

① [美] 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史建云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第 6 页。

② [美] 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史建云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第 7 页。

他是乌克兰人。在他小时候，乌克兰许多农村里没有人识字，连东正教牧师也不识字，都只能很简单地背一点经文。19世纪时，农村里大多数人一辈子就洗3次澡：出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和结婚的时候。贫穷落后到这样的程度，怎么能够和荷兰这样的国家放在一起作为“欧洲”？荷兰今天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在16、17世纪更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甘肃和江南，在经济上的差别也非常大。今天甘肃的整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海固，是西吉县、海原县和固原县3个县名首字的简称，原属甘肃省，后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极其穷困，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全球最不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与此相对照的是江南，一直被称为“富甲天下”。甘肃和江南之间的经济差别不逊于乌克兰和荷兰之间的差别，甚至还更大。因此彭慕兰说，不能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能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他指出：在中国和欧洲这两个大陆内部，有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地区，例如英国、荷兰和中国的江南。所以他在《大分流》中指出“分布于整个旧大陆的各种各样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和尼德兰、古吉拉特——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它们周围其他大陆或次大陆地区不具备的（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广泛发展的手工业生产、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对这些区域直接进行比较，而宁可引入那些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贸易、技术传播及其他等等的主要模式都没有多少相关的有着很大随意性的大陆单位呢？”<sup>①</sup>因此，要进行比较，就应该选择具有可比性的地方来进行比较。他这本书紧紧扣住了这一点，推翻了过去历史学界的很多共识，在国际学界引起轰动，他也因此当选了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是对他成就（特别是对他提出“大分流”理论）的肯定。

### 三、比较与量化方法

墨子说“异类不比”，接着还有一句是“说在量”。“异类不比，说在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比较的对象不仅要属于同一性质，而且要有数量，才能够比较。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是用描述的方法进行比较。如通过一些欧洲人写的游记等，说英国人有清教传统，所以工作很勤奋，而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很懒惰。但是我们也不难找出相反的材料，说中国人很勤奋而英国人懒惰。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要克服这种缺陷，量化方法是很重要的。例如，过去比较研究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所研究的实际上只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侧面，但得出来的结论却是全局的，因此很容易被质疑甚至推翻。

我们以江南经济史为例来看看这个问题。江南地区，从地域来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江南包括如今的上海、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16个市；狭义的江南则是清代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8个府和太仓州。我为什么会花几十年研究这一地区的经济史？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的资料非常丰富。江南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中国科举最盛的地区，留下的东西也特别多。仅就地方志来说，江南的地方志基本上都是几十年就修一次，而且每一次修志都很认真。不仅府、州、县，连市镇、村子也都有自己的地方志。虽然经历了战火和政治动荡，许多地方文献被毁了，但是去看看《中国地方志综合目录》，保留下来的仍然是全国最多的。因此，做江南经济史研究，材料当然比别处充分，学界的研究也比对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更深入。我40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选取了江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1982年，我开始写博士论文，找来日本人编写的《东洋学文献类目》，这是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发行的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史研究索引之一，收录了中、英、日、法、俄5种文字发表的中国史研究论著的篇名和简单介绍。仅就中、日、英3种文字写成的中国经济史论著来看，研究江南的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研究中国全国性问题的绝大部分论著，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江南。所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江南研究是最充分的。江南经济史研究的论著，涉及工

<sup>①</sup>[美]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业、农业、租佃制度、货币、贸易等各个方面。但都是经济发展的某一方面。但是一个经济是由各个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整体。各个部分是怎么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 却一直未有研究。没有这个整体, 只就自己研究的某个侧面, 就对江南的经济整体水平进行评价, 说它怎么发达或者怎么落后, 显然是不科学的, 有点“瞎子摸象”的味道。因此, 即使是过去中外学界研究最好的江南, 由于存在上述的问题, 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出现很多矛盾和冲突。因此, 明清时期江南整体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定论。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天差地别。例如, 过去人们说江南“富甲天下”, 但是到 20 世纪, 大多数学者却认为这个地方非常贫困。陈振汉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 “地租额不特侵吞了(农民)全部和剩余劳动, 甚且已榨取了大部分的必要劳动, 使得农民所有, 甚至不足‘维持肉体生存’”。<sup>①</sup>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黄宗智先生也认为, 在明清至民国的几百年中, 江南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 仅能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江南人民生活极其贫困。以此为基础, 陈振汉先生认为, 这是农民起义主要的根源, 黄宗智先生认为, 是 1950~1980 年实现集体化等的前提。他们都是优秀的学者, 其结论也都是有史料支持的。

但也有另外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景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于 1832 年 6 月来到中国的上海, 他在日记中写道“人口看来甚为稠密, 但乡民们身体健康, 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食物。我们在此期间, 地里小麦刚收割完毕, 土地耕耘、灌溉后紧接着又种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见当地土壤之肥沃异常。当地的冬天据说十分寒冷, 有些年份数英尺深的积雪可经月不化, 冰块大量地存放到夏季, 主要用于保存鲜鱼……(在上海县城)除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买到的牛肉之外, 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 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 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 价格十分便宜, 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sup>②</sup> 可知, 在英国人眼里, 这里的人民生活得不错。上海当时并不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 最繁荣的城市是苏州, 到太平天国战争把苏州摧毁后, 苏州的有钱人都跑到上海去了, 在租界的保护下, 上海才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最发达的城市。那么,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苏州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1845 年, 法国有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 代表团成员耶德到了苏州, 称苏州为“世界最大的都市”, 并说: “谚语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 气候温和, 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 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 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 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 是世间的极乐土, 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sup>③</sup> 他对苏州的称赞绝非信口开河。在当时, 苏州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居民大概有 150 万人, 等于欧洲各国首都城市人口的总和。这两个外国人都亲眼看到当时江南人民的生活如此富裕, 因此江南绝不会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

为什么对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你可以说陈振汉、黄宗智先生说的只是农民。但在当时的江南, 农民占人口主体。如果农民生活极度贫困,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可能那么繁荣? 因此, 对于同一个事物, 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法, 哪怕有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记载, 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错误的。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 即使所用的史料正确无误, 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到正确的结论, 还需使用合适的方法。在这方面, 量化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①陈振汉《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载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35页。

②[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记事》,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77~279页。

③[英]耶德《万物解》,转引自[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达》,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3页。

#### 四、量化方法在比较研究中的运用实例

量化方法的适用领域之一是 GDP 的研究。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 事实上,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在创造 GDP。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 GDP 比任何描述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同时, 因为 GDP 衡量的是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 比衡量总值的指标更少重复计算。而且, GDP 不用成本、利润等会计方法, 计算时较少“灵活性”。因此相对而言, GDP 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今天, 从最不发达的国家如巴布亚新几内亚, 到最富的国家如北欧三国, 都可以用 GDP 这个客观的中性指标来表现其经济状况。那么, GDP 研究能不能应用到过去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上? 是可以的, 这就是历史 GDP 研究, 是西方学者创立的研究方向。

我对 19 世纪初期江南和荷兰经济状况进行的比较研究, 就是用 GDP 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的主要结果是我 2010 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此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和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济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现在正在翻译为英文, 2018 年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英文版。这本书所研究的地方是 20 世纪 20 年代松江府的华亭县和娄县两个县。在今天, 这两个县是上海市的松江区,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面积为 600 平方公里, 人口 66 万。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时, 面积稍大, 而人口约有 52 万。

我本来没有做过历史 GDP 研究, 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做。2001 年, 参加了一个在瑞典开的经济史会议。与会学者中, 有一位来自荷兰的范·赞登 (Jan Luiten van Zanden), 他是荷兰经济史研究权威, 也是历史 GDP 方法的创始者之一。有一天, 我们一起散步闲聊, 他说“我读了你的那本关于江南农业的书 (即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很感兴趣。如果把书中的地名、人名、术语和农作方式换成荷兰的地名、人名等, 就好像在说荷兰一样。”他的话使我非常吃惊, 说“真有那么像吗?” 他说“真是这样”。并且建议“既然江南和荷兰那么相像, 那我们一起来写一篇江南和荷兰比较研究的文章, 怎么样?” 我说“好呀。”但是回国之后仔细想想,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 因为他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对近代早期荷兰 GDP 进行研究, 而这种方法我当时连听都没有听过。后来他把他的书寄给我, 于是我看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进一步读关于历史国民账户系统方法的书。学会这种方法, 我收集史料, 建立自己的研究数据库, 设计各种计算公式, 进行分析和研究。由此用了 8 年时间, 写出了《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一书。这本书写完后, 我和他合写了 *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比较江南和荷兰两个地区在 19 世纪初期的经济状况。由于我们的比较对象有明确的时空范围, 又使用同样的标准和方法, 而且都以自己对相关地区的第一手研究为基础, 因此所得结论当然比较接近真实。

为什么选择 19 世纪初期的荷兰和江南进行比较? 荷兰是一个小国, 面积很小, 19 世纪初人口才两百多万, 但在历史上它曾经非常的辉煌。在英国兴起之前, 荷兰是整个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在 16 世纪, 荷兰是西方世界的海上霸王, 在亚、非、美洲都有很大的海外殖民地, 而比较的另外一方江南, 至少从南宋以来, 就是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 这里出现了许多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变化。

在近代早期的经济成长方面, 江南和荷兰也有很大的可比性。至少 1400 年以来, 荷兰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欧洲名列前茅。1579 年荷兰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后, 更进入一个长达 1 个多世纪的快速而持续增长, 被称为经济史上的“荷兰奇迹”。到了 17 世纪, 荷兰在生产率和技术上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 自 1600 年至 1820 年, 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是欧洲最高的。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的结论。<sup>①</sup> 英国虽然后来居上, 但英国的发展从荷兰受惠很

<sup>①</sup> 参见 [英]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公元 960~2030 年)》, 伍晓鹰, 马德斌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多。17世纪中期,英国陷入了长期的内乱,最后邀请英国国王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公爵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成为英国国王,即威廉三世。之后英国大量招募荷兰农民、工匠、技术人员等到英国开荒、发展工业,于是英国政局稳定了下来,经济也发展了起来。英国崛起后,荷兰就被英国所超越了,而且还受到了英国的压制。很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日本也长期受惠于中国的江南。到日本兴起后,迅速超过了江南,并给江南严重的破坏。这两个曾经的先进地区,都被临近的岛国压制,这也是一种经济史上的可比性。

在地理位置上,荷兰和江南都位于大洋边,并靠近西欧或东亚最大河流的出海口。江南在长江口,荷兰在莱茵河口。这使得这两个地区能够进行广泛的内贸和外贸。荷兰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拥有欧洲五分之四的商船,荷兰的商人跑遍全世界。江南是中国和东亚的商业中心,全中国的大商人都跑到了这里做生意,江南的产品畅销全世界。如江南产的丝绸的80%都销往外地,远及欧洲和美洲。到了清代,江南出产的棉布也大量销往欧美。地理位置给这两个地区非常大的便利。

在空间范围方面,这两个地区的可比性也很高。广义上的江南的陆地面积是3.9万平方公里,而荷兰是3.4万平方公里(但19世纪初两地人口差别达10倍以上)。这两个地区内部的地形也非常相像。江南地势低洼,东部江南平原的平均海拔大约只有4米左右。荷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分之一的国土是填海造出来的。现在为止,荷兰还有很多土地低于海平面。另外,这两个地区都有大量的湖泊、沼泽、运河。江南自古被称为水乡泽国,苏州号称水城,阿姆斯特丹河网密集,比威尼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区内河流综合交错,使得这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

综上所述,两个地区空间范围大体相当,地理位置、地理状况也都大体相似,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也都比较接近,而且后来的命运也都颇为类似。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可比性,我们才选择这两个地区进行比较。而从时间上看,在19世纪的头20年,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它们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领先地位,被临近的岛国超过。荷兰和江南的经济曾经都很发达,但是没有自行出现工业革命。这一点,和大多数国家有共同之处。因此,研究荷兰和江南为什么不能自行发生工业革命,对于世界经济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要对19初期荷兰和江南的整体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必须借助于量化的方法,进行GDP的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使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Historical system national account)进行研究。GDP研究有不同的方法,现在用得最普遍的就是国民账户系统。这种方法就像记账,记下所有的投入(input)、产出(output),然后计算创造出来的增加值(value)。这个增加值就是GDP。研究过去的GDP,就必须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的方法来研究。使用这种方法,我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然后和范赞登使用同样方法得出来的荷兰经济的结果进行比较。大体上来说,在19世纪10年代的荷兰和19世纪20年代的松江,第一产业(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松江大概占到31%左右,荷兰则占27%左右,都不到三分之一。第二产业(工业)所占的比重,松江约为35%,荷兰约为30%。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江南为36%,荷兰则为46%。与此相应,在劳动力就业结构方面,江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的27%,而荷兰为43%。从前大家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经济”中,农业是最大的产业部门,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但在19世纪初期的江南和荷兰两个地区,都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商业主导的社会了。因为工商业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这两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也很高。在荷兰,城镇居民数量占全部居民总数的35%,松江则占40%。住在农村里的居民,也有许多人从事工商业,因为很多工业在农村里。

从这个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差异。例如,荷兰的外贸在GDP中的比重远大于江南。这是因为江南主要依靠广大中国国内市场,而荷兰则因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不很好,经常被敌国封锁,因此不得不向海外发展。

最后，我和范赞登合作探讨 19 世纪初期江南和荷兰两个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问题。我们把两地的人均国民收入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出来，折算为 1 990 美元，结果为松江（华娄）1 015 美元，荷兰 1 838 美元，而麦迪森计算的同期西欧的人均国民收入是 1 194 美元。也就是说，松江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荷兰的 55%，而与西欧持平。这里说的西欧指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是欧洲最发达的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利用量化的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了：19 世纪初期的江南不是一个贫困的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西欧差不多而落后于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以往学界对鸦片战争以前江南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两种看法：富甲天下和极度贫困，尽管都列出了许多证据，但仍然不能服人。要得出真正客观的结论，量化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量化方法在比较史学中运用的一个例子。

从量化方法中得出来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世界上的第一个近代经济，从前大家认为是英国，但荷兰经济史学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和范·德·伍德（A. M. van de Woude）的《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持续，1550~1815》这本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第一个近代经济不是英国，而是荷兰。他说：荷兰经济在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时期中，已经发展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经济，但是所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技术。因此，尽管使用的是传统的技术，仍然可以出现一种近代经济，即早期近代经济。这是荷兰的经验所体现出来的发展模式。<sup>①</sup> 德弗里斯说：早期近代经济不必具有 20 世纪工业经济的外观，而是包含了那些使得上述外观成为可能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中最重要者如下：（1）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都相当自由和普遍；（2）农业生产率：足以支持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而使得意义深远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3）国家：其决策和执行都关注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但同时对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则漠不关心；（4）技术与组织：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组织，能够胜任持续的发展和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以维持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如果具备了他所列举的近代经济的那些重要特征，就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的经济，当然如果还依靠传统技术的话，就是一个早期近代的经济。我对 19 世纪初期松江经济进行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果与荷兰颇为相似。上述这些特征，江南经济都具有，江南也是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经济。因此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已经是一个早期近代经济，尽管也依靠的是传统的技术。

荷兰早期近代经济成长的是斯密型经济成长。斯密型成长与工业革命开始后出现的库兹涅兹型成长都是近代经济成长。但是斯密型的成长是一种依靠市场扩展和劳动分工的近代经济成长，没有技术革命和组织变革；而库兹涅兹型成长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斯密型成长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库兹涅兹型成长，但没有斯密型成长，库兹涅兹型成长是不可能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库兹涅兹型成长的开端，通过工业革命，出现了我们一般理解的近代经济。斯密型成长也会导致一种由商业化推动的近代经济。这两者都是近代经济。工业革命并非到处可以发生，它的发生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比方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里格莱（E. A. Wrigley）认为，能源是英国经济革命最重要的基础，因为英国拥有丰富而易于开采的煤矿。《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和“英国报纸之父”的笛福，在 18 世纪初已注意到了煤矿对英国的重要影响，说：大自然对英国特别厚爱，使它拥有最好的地理位置、急湍的流水和不易淹没的煤矿。由于产煤多，英国的人均煤消费量在 17 世纪末已达 459 千克，伦敦更高达 816 千克。这个人均消费量，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高的。与此相对照，荷兰在能源方面条件很差，其能源主要靠泥炭，产量不高，热值很低，不能符合工业革命对能源的要求。至于江南就更差了，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计算的结果是，清代中期江南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折合

<sup>①</sup> 参见 De Vries, Jan, and A. M. van de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成煤, 大约只是几千克而已。如果没有煤, 就没有办法建立重工业; 没有发达的重工业, 社会的再生产就难以扩大。所以荷兰和江南没有、也不可能自行出现工业革命。

尽管斯密型成长不能导致库兹涅兹型成长, 但是二者都是近代经济成长, 因此都有一些共同的经济近代性。比方说二者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市场, 以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 有足够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供足够的粮食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工商业人口; 有完备的金融体系, 为工商业发展筹集资金; 等等。如果没有这些, 工业革命是不能够出现的。在这些方面, 19 世纪的荷兰和江南都走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前面。因此, 这两个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 但是它们的斯密型发展也为后来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留给江南的这份遗产, 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不能比的。这就是为什么从 19 世纪以来, 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其他地方表现更为突出的原因之一。19 世纪中后期上海兴起之后, 迅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个工业化地区。到了抗战前, 上海的现代工业产值占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上海迅速实现工业化, 很大程度上说得益于西方资本、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但除了资本、技术和管理之外, 西方的到来也使得长期困扰江南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得以解决。例如在抗战以前, 上海每年输入 400 万吨煤, 解决了以往能源严重匮乏的问题。这时也大量进口江南缺乏的各种金属材料。能源和材料的大量输入, 为上海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但江南现代工业的发展, 外来因素虽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不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中国, 作为英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的香港, 所接受的外来因素比上海更多, 但直到 1950 年, 与上海相比, 香港依旧是一个第二等的商港, 没有什么工业, 贸易量也远比不上上海。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都在上海, 上海的人口也比香港多好几倍。

著名经济学家柏金斯 (Dwight Perkins) 指出: 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起飞,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几个世纪的“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 (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没有这个预先积累, 今天的经济奇迹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江南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能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马当先, 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地区近几十年来会出现经济奇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 1979 年, 但江南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从 1992 年才开始, 比广东、福建晚了 10 多年。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头一二十年, 大部分外资、技术和管理到了广东和福建, 4 个经济特区都在这两省。广东、福建 (特别是珠三角) 经济发展得很不错,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地区。但到了 1992 年上海真正开放之后, 江南就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广东和福建。在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各地区中经济表现得最好的另外一个地区是广东。广东人口和江南差不多, 都是 8 000 多万, 面积则比江南大很多。但是 2009 年广东全省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都只是江南的三分之二。我有一篇文章《“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专门讨论江南在 1992 年以来的经济成长。<sup>①</sup> 1978 年江南 GDP 只有 443 亿美元, 到 1992 年也就增到 654 亿美元。但到了 2009 年, 却猛增到 8 786 亿美元。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广义的江南地区有 8 000 万人口, 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如果江南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 2009 年它的 GDP 将和意大利并列全世界第十名, 比俄罗斯、韩国都更大, 比墨西哥、土耳其、印尼这些大国更要大很多。从人均 GDP 来看, 江南 1978 年人均 GDP 大约只相当 1 200 美元, 比松江在 1 个世纪以前差不了太多, 不到同期法国的八分之一, 英国的五分之一, 只相当于西欧最穷国家葡萄牙的二分之一。但是到了 2009 年, 江南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21 000 美元, 相当于同时期英国的 60%, 法国的 65%, 和葡萄牙持平, 大大高于前苏联集团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 比俄罗斯更要高出许多。所有这一切都是 20 年之内出现的, 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

为什么江南的经济表现如此优秀? 如果没有它几个世纪的早期经济近代化经历所留下的结

<sup>①</sup> 参见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2 期。

果，是不可能的。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央给广东、福建的政策比给江南的更优惠，广东、福建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比江南要少很多。但到了后来，广东和福建还是无法赶上江南。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基础不同。因此，一个地区没有柏金斯所说的“经验和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就是给它优惠的条件和大量的援助，也不一定发展得起来。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有一本书叫做《资源的诅咒》，说许多非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带来灾难。例如，尼日利亚有很多石油，请外国人来开采出来后，有了大量的石油收入，但结果是政府却变得非常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了。

马克思有一段话和柏金斯的话有共同之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sup>①</sup>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都期待把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是走了不少弯路，一个原因就是过去缺乏正确的认识。

松江（以及江南）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社会，已经有相当的“预先积累”，因此一旦给它合适的条件，就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我在我的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那本书里说道：实行城乡分离的政策，农村里聪明的孩子念了高中和大学都不愿意回去，因此形成了长期的人才单向流出。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留在农村里的农民却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世代代留下来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可以迅速地适应新的市场经济，成为农民企业家和技术工人。这就是“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所起的作用。在没有这种“预先积累”的地方，人为地去扶植这个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是很困难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割断历史，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德国大诗人歌德两个世纪前说过一段话“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sup>②</sup>从更深的地方去挖掘今天中国的成功和问题的根源，是大家未来的责任。

## Quant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LI Bozhong

**Abstract:** Both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But how to apply the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s still an issue we have to straighten out first. The issue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major problems in past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stud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r aspects will be useful for a thorough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with the two approaches.

**Keywords:** quantification, comparison, south-of-the-Yangtze regions, economic history

(责任编辑 廖国强)

<sup>①</sup>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sup>②</sup>转引自[英]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部《金钱的先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43页。